

空间视域下江户时期知识传播 对庶民社会性格的形塑探究

张心越 陆薇薇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摘要 | 作为日本历史上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江户时期的知识流动空前繁荣，庶民文化崛起。本论文从空间视域出发，综合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生产理论以及丸山真男的文化接触论，着眼于固定空间、流动空间，以及异空间三个层次，系统阐释江户庶民文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以揭示其与庶民社会性格特质形成的内在关联。研究表明，不同空间形态下的知识传播对庶民社会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固定空间通过制度化的知识启蒙与日常化的社交信息交互，塑造了江户庶民务实理性与开放灵活的价值取向；流动空间借助特定群体与“贷本”等特殊知识传播媒介，大大促进了庶民群体非正式知识网络的形成，培育出开放性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模式；异空间作为与“他文化”接触与互动的场域，催生了江户庶民兼具文化主体性与多元包容性的精神品格。本研究为解构日本近代国民性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也为理解日本江户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 江户时期；知识传播；空间生产；庶民阶层；性格形塑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x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江户时期是日本社会结构与文化格局深刻变革的关键阶段。随着幕藩体制趋于稳定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庶民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其文化需求随之增长。庶民不再仅满足于生存性知识的获取，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体验，这促使文化逐渐渗透至社会各阶层。经济条件为知识获取提供物质保障，社会文化结构与政策调整则降低了庶民接触上层文化的门槛，使文学、艺术等高雅文化逐步进入日常生活，平民艺术蓬勃发展。同时，印刷技术普及与出版业发展，使

书籍成为可广泛获取的知识载体，推动庶民文化知识的系统传播^[1]。

现有研究多关注江户文人及官方机构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涉及儒学思想、小说创作、文人画及汉诗交流等方面，但庶民群体的知识获取方式、文化实践及其对社会性格塑造的作用仍是学界薄弱环节。部分研究聚焦寺子屋、贷本屋等知识载体，揭示知识平民化趋势，但缺乏对各类知识传播空间及其互动关系的整体分析。由此，江户时期知识传播在社会阶层差异、空间实践与性格形成方面仍存在显著研究空白。

通讯作者：陆薇薇，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日本民俗学、性别研究。

文章引用：张心越，陆薇薇. 空间视域下江户时期知识传播对庶民社会性格的形塑探究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5, 7(9): 736-740.

<https://doi.org/10.35534/pss.0709125>

为回应这一空白，本文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丸山真男的文化接触论。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为社会实践、意识形态与文化互动的产物，通过空间实践、表象空间与再现空间的多维视角，为分析庶民在地域生活空间中的知识获取与社会互动提供理论支撑；文化接触论强调社会群体在外来文化介入下的选择性吸收与本土化再创造，为研究庶民在异空间接触外来知识与文化并塑造社会性格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将空间生产理论与文化接触论有机结合，系统分析江户庶民在固定空间、流动空间与异空间中的知识获取、传播与转化机制，并探讨其对庶民社会性格形成的影响。通过这一研究，旨在揭示江户时期知识传播的空间化特征与庶民文化发展规律，同时为理解近代日本国民性生成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2 固定空间的知识传播与庶民社会性格形塑

固定空间指在地理上固定、具有长期稳定性的知识传播场所，也是庶民日常活动的空间。江户时期，寺子屋、居酒屋与钱汤作为典型的日常空间，在知识传播与庶民社会性格塑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1 寺子屋：启蒙知识传播的空间实践

寺子屋（てらこや）作为江户时期庶民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庶民子女获得启蒙知识、社会规范及基本技能的空间。寺子屋的成立与江户时期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虽有一定的慈善动机，但更多是基于经济需求和庶民的自主需求形成的私立教育机构。不同于幕府主导的官立教育，寺子屋是庶民根据自身需求自发建立的教育设施，反映了当时江户社会中庶民阶层对教育的迫切渴求和对自我提升的重视，此时的江户呈现出“教育热潮”。

寺子屋的教育内容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尤其关注“算用”等日常必备技能。庶民的孩子在寺子屋中不仅学习基础的汉字和书写，还重点学习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算术等技能，这些知识的传授直接回应了江户社会中庶民的实务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幕末时期，越来越多的寺子屋开始将“读、写、算”三项基本课程结合起来，逐渐向近代小学教育模式靠拢^[2]。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满足了庶民对基础文化素养的需求，也使寺子屋的功能逐步趋向多元化，成为培养庶民子女实际生活能力的核心场所。

此外，寺子屋也为庶民群体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知识传承平台，使江户时期庶民社会形成了一种较为平等的教育机会。虽然其教学内容较为简化，但为庶民阶层提供了踏入更大社会的认知工具，帮助他们适应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社交场合^[3]。可以说，寺子屋不仅是庶民子女的启蒙空间，也是他们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培养了他们遵循社会规则与传统习俗的基本行为模式。

2.2 居酒屋与钱汤：社交知识传播的空间实践

庶民社会中的知识传播并非仅局限于正式的教育场所，社交空间同样发挥着关键效能。居酒屋（いざかや）与钱汤（せんとう）作为庶民日常活动的高频场所，在社交知识传播维度，以其独特的社交模式，构建起别样的知识传播生态。

1811年，应江户町奉行所的要求，町年寄曾开展调查，结果显示江户当时共有居酒屋1808家。若以当时约100万的人口规模推算，相当于平均每553人就拥有一家居酒屋^[4]。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审视，居酒屋属于典型的非正式社交空间，却在江户庶民的知识摄取与社会认知构建中扮演核心角色。其空间布局往往紧凑且富有生活气息，简陋却温馨的陈设，为庶民提供了一个能够暂时脱离繁重劳作与生活压力的场所。在这一空间内，知识传播借由人际互动的多向交流得以实现。居酒屋中常见的话题涵盖经济民生、文化娱乐乃至政治时局。庶民们在推杯换盏间，分享各自在不同行业、不同生活场景中的见闻与经验。这种交流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更是知识的深度交换与整合。例如，商人会分享市场行情的波动与商业策略的运用，工匠会交流工艺技巧的改良与创新，普通劳动者则会讲述日常劳作中的实用窍门。这种基于多元生活经验的知识交流，极大地拓展了庶民的知识边界，提升了他们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与适应能力，进而塑造出具有较强应变能力与社会参与意识的庶民性格特征。

钱汤，作为江户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社交空间，在庶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性格的塑造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江户时代，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公共浴场数量迅速增长。据《守贞漫稿》记载，江户的钱汤最早可追溯至天正十九年，到天保、嘉永年间已多达六百余家，成为庶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5]。

江户钱汤的空间格局别具一格：入口处设有土间与番台，脱衣所、洗浴场与浴槽布局与今日相似，但浴池入口多设“石榴口”，须弯腰进入，以保持水汽与热度。这种充满蒸汽的半公共空间营造出放松、平等的氛围，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身份与阶层隔阂。无论是下级武士还是长屋平民，都能在此以坦诚、无遮掩的姿态交流，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私密又开放的社交场域，由此，钱汤不仅是消除劳作疲惫的休憩场所，更是庶民进行信息交流与意见传播的“公共论坛”^[6]。这种交流往往带有情感属性。泡汤过程中人们坦诚相见，通过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增进了彼此的情感联结，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传统生活智慧、道德规范与社会习俗在此空间内也得以自然传承：长辈向晚辈传授养生保健之道，邻里之间交换育儿经验或处理纠纷的方式。这种基于日常实践的知识流通，使庶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形成了重视家庭、讲求和睦、尊重传统的社会性

格。由此可见,钱汤既满足了清洁与休养的需求,又承担了交往与文化传播的功能,是社会关系不断被建构与再生产的舞台。

2.3 固定空间中的庶民社会性格形塑

江户时期的寺子屋、居酒屋与钱汤,作为固定空间的典型代表,在庶民知识传播与社会性格形塑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

寺子屋在教育层面开启了庶民知识摄取的大门。它虽为私立教育机构,却因契合庶民经济与自主提升需求,强调“实用主义”,成为庶民阶层打破知识垄断的关键力量。不仅赋予庶民子女基本生活技能,更在知识传承中,培养出他们对社会秩序的初步认知,为庶民阶层融入社会大环境提供了知识与心理的双重准备。居酒屋、钱汤作为社交与信息交互的前沿阵地,构建起庶民与社会多元信息沟通的桥梁。其独特的社交属性,让不同身份的庶民能在其中交流信息、分享经验。这种交流不仅丰富了庶民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在不断接纳、整合各类信息的过程中,庶民逐渐形成适应复杂社会的灵活思维与开放态度,成为推动江户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民间活力源泉,也塑造了庶民社会性格中积极参与、勇于应变的一面。

从宏观社会发展视角来看,固定空间的协同作用,在知识、社交、价值观层面,全方位塑造了庶民的社会性格,构建起江户庶民社会独特的文化生态。它们促进了庶民阶层内部的团结协作与知识共享,推动了不同阶层间的信息流通与文化融合,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为江户时期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文化动力。

3 流动空间的知识传播与庶民社会性格形塑

在江户时期,流动空间凭借其独特的动态特性,构建起区别于固定空间的知识传播体系。本文中的流动空间,其知识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流动群体和书籍,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和复杂机制。

3.1 流动的书:以贷本为介的知识流转

贷本屋(かしほんや)作为书籍的流转枢纽,在江户城市空间布局中有着显著分布规律。大多聚集在江户的神田、日本桥等人口密集、庶民日常出行频繁、商业活动高度活跃的区域。贷本屋的店内空间布局紧凑且功能分区明确,书架依照书籍的类型、题材细致分类,新到书籍及热门畅销书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以吸引顾客注意力^[7]。

从书籍流通模式来看,借阅是贷本屋最核心的业务。江户时代的庶民受经济条件限制,更倾向于以低成本租借书籍满足阅读需求。这种借阅模式不仅契合了庶民的经济状况,还培养了他们频繁阅读的习惯^[8]。同

时,贷本屋也会销售部分书籍,以满足对特定书籍有收藏需求或希望长期拥有阅读资源的顾客。此外,贷本屋经营者还承担书籍中介角色,当顾客提出特殊书籍需求时,会积极从出版人处获取相关书籍,进一步拓宽了书籍的流通渠道^[9]。

贷本屋的书籍充当着知识流动的重要介质。经营者走街串巷,将书籍带到庶民的家门口,使知识的传播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而且,贷本屋中的书籍内容丰富多样,流行文学作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作品以精彩的故事、精美的插画,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激发了庶民的想象力,满足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3.2 流动的群体:飞脚的知识传递

江户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网络的完善推动了人员与物资的频繁流动。飞脚(ひつきやく)作为近世交通通信体系的重要角色,承担了书信、公文以及小件物品的递送任务。他们往返于三都及各城下町之间,极大缩短了消息传递的时间距离,满足了幕府、大名及商人的政务与经济需求,大大降低了人员往来的障碍^[10]。

江户飞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幕府公用飞脚,承担政务文书的传递;二为大名飞脚,维系藩与幕府之间的行政与财政联系;三为町飞脚,由江户、京都、大坂等地商人协同创办,主要面向庶民社会,递送书信及小件货物,以“六日飞脚”为代表,构成了近世日本最活跃的民间通信网络^[11]。

对庶民而言,随着往来日益频繁,飞脚尤其是町飞脚,除了书信与货物,还带来了地方新闻、社会流言与文化话题,这些信息往往在驿站与市集中通过口耳相传扩散开来,成为庶民日常知识的重要补充。飞脚的高流动性,使信息能够跨越地域界限广泛传播,从而在江户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跨地域的“信息共同体”。

3.3 流动空间中的庶民社会性格形塑

流动的书与群体所带来的知识传播,全方位塑造着庶民的社会性格。贷本屋培养了庶民热爱阅读的习惯,丰富的书籍内容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使其在阅读中构建起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庶民接触到多元的思想和观念,文化素养在持续阅读中得以提升,思想逐渐解放,不再局限于传统思维模式。

飞脚等流动群体带来的多元知识,让庶民变得开放好奇。他们对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充满兴趣,渴望了解更多外部世界的信息。在接触新知识的过程中,庶民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不断尝试新观念和新方法,逐渐适应变化,形成了积极向上、勇于探索的社会性格。这种性格特征不仅推动庶民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为整个江户社会注入活力,促进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同时,庶民在与流动群体的交流互动中,学会了尊重不同的文化

和观点，培养出包容心态，进一步丰富了庶民社会的文化内涵。

4 异空间的知识传播与庶民社会性格形塑

异空间是指庶民接触并吸收外来文化、知识的场所。在锁国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异空间作为“受限的开放场域”，承载着与外来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使命，深刻影响着庶民的知识体系和社会性格。异空间打破常规的地域和文化界限，为庶民接触“他文化”提供独特平台，在此空间中发生的知识传播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态势。

4.1 兰学的兴起：与西方知识交互的空间实践

兰学是日本江户时代对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学术、文化和技术的总称。由于当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荷兰成为唯一与日本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西方国家。通过与荷兰人的接触，日本学者得以学习西方的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知识^[13]。兰学的传播不仅限于学者之间，还通过翻译、出版、教育等途径，逐渐渗透到庶民社会，推动西方知识的民间化。

值得注意的是，庶民并非通过直接接触荷兰人或西方书籍获得兰学知识，而是依靠既有的固定空间和流动空间的协同作用，促成知识的扩散。固定空间为兰学的学习和知识留存提供稳定的场所，而流动空间则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再生产。这种双重空间的交互，推动了西方知识的民间化，使得兰学不仅局限于学者圈层，也逐渐影响到更广泛的庶民社会。

4.2 儒学世俗化：与中国思想的融合与转变

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并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他们致力于引进宋明理学，以对抗长期占据人们精神世界的佛教思想，转变以往神佛本位的世界观^[13]。

随着时间推移，儒学思想逐渐渗透到庶民生活中，呈现出世俗化趋势。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孝道、忠义等，被广泛传播，并融入庶民的日常生活和价值体系。寺子屋等教育机构的兴起，使庶民子弟有机会接受儒学教育，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世俗化。

此外，儒学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体系。例如，二宫尊德将儒学的伦理道德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提出报德思想，强调勤劳与节俭，这些理念对庶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4.3 异空间中的庶民社会性格形塑

根据丸山真男的文化接触论，文化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流动并非简单的“移植”或“复制”，而是包含选择、适应和再创造的过程^[14]。在江户庶民的知识传播过

程中，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他们如何在异空间中吸收外来知识，并根据自身文化需求进行调整和本土化。

首先，江户庶民展现出较强的“选择性吸收”能力。正如宋念申指出，17世纪后期的东亚并非西方单方面介入的被动地区，而是拥有自身复杂结构与应对能力的能动主体^[15]。江户庶民并非被动接受外来文化，而是依据自身的需求对知识进行筛选。例如，虽然西方传入了大量的医学理论，但庶民主要接受的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实用医学知识，如外科手术、草药治疗等，而对于较为抽象的理论部分接受度较低。同样，在对待中国文化方面，江户庶民对儒学的接受程度较高，但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体现了庶民对外来文化的主动选择性。

其次，江户庶民展现出较强的“本土化再创造”能力。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文化创新的主体。例如，中国传入的《三国志演义》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经历史本土化改编，产生《通俗三国志》等符合日本审美与价值观的版本^[16]。

最后，异空间的知识传播增强了庶民的“文化包容性”。在接触西方医学、天文学、军事技术等知识后，江户庶民逐渐意识到世界的多样性，开始形成更开放的文化态度。这种文化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上，也体现在庶民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交流中。随着异空间知识传播的扩大，庶民之间的身份界限逐渐模糊，他们的社会性格变得更加灵活、多元，愿意接受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5 结论

江户时期，固定空间、流动空间与异空间中的知识传播对庶民社会性格形塑产生了深远且独特的影响。固定空间通过制度化教育与日常社交，赋予庶民务实理性、开放灵活的性格特质；流动空间借助群体与书籍的流动，构建起非正式知识网络，培育了庶民开放好奇、勇于探索的精神；异空间则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塑造了庶民兼具理性创新、尊重传统、包容多元的精神品格。

从空间视域研究知识传播，为理解江户时期社会文化提供了全新视角，揭示了庶民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如何突破传统束缚，构建新型认知模式，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革。这种以实用为导向、以体验为媒介、以共享为特质的知识传播体系，瓦解了传统知识等级制，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认知基础。

参考文献

- [1] 坂本太郎. 日本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2] 吉田太郎. 寺子屋における歴史教育の研究

- [J]. 横浜国立大学教育紀要, 1966(6): 39-59.
- [3] 李巧娟. 关于江户末期寺子屋功能的考察[D]. 南京大学, 2017.
- [4] 饭野亮一. 居酒屋の誕生: 江戸の呑みだおれ文化[M]. 东京: 筑摩書房, 2014.
- [5] 喜田川守貞. 近世風俗志一守貞漫稿[M]. 東京: 岩波書店, 2002.
- [6] 杜海怀. 浅谈日本澡堂文化[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9(11): 99-101.
- [7] 李胤錫. 江戸時代の貸本屋について[J]. 日本学報, 2006(67): 213-226.
- [8] 陈姗. 日本江户时期的阅读状况研究[D]. 湘潭大学, 2020.
- [9] 张博. 日本江户时代的出版业——从庶民阅读史视角的考察[J]. 古代文明, 2015, 9(1): 103-111, 114.
- [10] 藏并省自. 日本近世史[M]. 京都: 三和书房, 1976.
- [11] 卷島隆. 江戸の飛脚: 人と馬による情報通信史[M]. 东京: 教育評論社, 2015.
- [12] 冯玮. 对日本“锁国时代”吸收西方文化状况的历史分析[J]. 史学月刊, 1994(1): 74-80.
- [13] 杨立影.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在民间的普及[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2): 19-23.
- [14] 陈毅立. 丸山真男的文化接触论, 古层论探析[J]. 日本学刊, 2018(1): 134-145.
- [15] 宋念申. 发现东亚: 2版(修订本)[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24.
- [16] 钟小璐. “三国故事”的“日化”表现和原因分析[D].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moners' Social Character in the Edo Period: A Spatial Perspective

Zhang Xinyue Lu Wei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As a crucial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Japanese history, the Edo period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in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rise of commoner culture. This paper adopts a spatial perspective, drawing on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Maruyama Masao's theory of cultural contact,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within Edo commoner culture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fixed spaces, mobile spaces, and heterotopic space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different spatial forms of knowledge circulation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commoners' social character. Fixed space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education and everyday social interaction, fostered pragmatic rationality and flexible openness; mobile spaces, facilitated by specific groups and unique media such as lending librarie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l knowledge networks and cultivated an open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mindset; heterotopic spaces, as arenas of intercultural contact and exchange, gave rise to both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a spirit of pluralistic inclusivenes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the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Edo period.

Key words: Edo perio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Spatial production; Commoner class; Character formation